

## 译者的话

约翰·塞尔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最为活跃的哲学家之一。他于1932年7月31日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早年在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学习,1955年获罗兹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受教于著名的牛津学派日常语言哲学家J·L·奥斯丁和P·F·斯特劳森等人。1959年他以《意义和指称》为题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至1959年曾在牛津任教。1959年回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任教,从1966年起至今任该校哲学教授。他曾先后被国内外许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由于他在哲学上的卓越成就,被选为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塞尔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是1969年出版的《言语行为:语言哲学方面的一篇文章》。该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1979年出版了他的另一本著作《表达和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这本书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他在第一本著作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将它应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1982年,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著作《意向性:论心灵哲学》,该书集中探讨了意向性问题。作者指出,这本书是为前两本著作以及将来的这些论题提供基础。塞尔认为,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心灵哲学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怎样表现世界上事物的状态,正是通过意向性问题,使他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结合起来。他从语言行为

的研究发展出意向性理论,然后又用意向性理论来说明语言,从而把语言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84年,塞尔应英国BBC电台的邀请为该年度的里思讲座作系列演讲,他将这个讲座的内容编成一本书,以《心、脑与科学》为题出版。这本书广泛地讨论了心灵哲学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心脑关系、心理因果性以及心脑关系与人工智能等问题。1985年出版了他的《以言行事的逻辑基础》,该书从逻辑上研究语言行为。1995年,出版了塞尔的《社会实在的构造》,该书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研究成果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同时又论述了有关真理符合论和外部实在论问题。1997年出版了他的《意识的奥秘》,该书系统地运用脑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成果来丰富意识问题的研究,是使哲学问题成为科学问题的一种努力。1998年,出版了塞尔的《心灵、语言和社会》,此外,塞尔还编辑出版了《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等。他的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他是一位涉及广阔研究领域、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的哲学家。

塞尔的《心灵、语言和社会》是一本简明通俗的哲学著作,但它既不是各种哲学问题的概览,也不是哲学问题的简史,而是概括了塞尔40余年来研究成果的重要哲学著作。这部著作有其显著的特色。

一、它是一本综合性或总结性的著作。塞尔以前的著作基本上是分别研究和论述许多重要的问题,如言语行为、意向性、社会实在等的专著,而这本书是对以前探讨和论述的诸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心灵、语言和社会问题)加以综合,使之连成一个融贯的整体。同时,也回答了一系列哲学上激烈争论的问题。塞尔属于分析哲学家,擅长逻辑分析,而本书包含了许多逻辑分析。它对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的结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逻辑

辑依存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它们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综合是一个分析哲学家所能进行的综合。正因为这样,本书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涉及广阔领域多方面的问题。

二、与一些语言哲学家局限于对语言使用的研究而回避或拒斥形而上学问题不同,塞尔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一书中一开始就讨论基本形而上学问题,并且把在这个基本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立场作为解决其他哲学问题的前提。他所说的基本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实在世界的存在及其可理解性问题。这个古老的问题到18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那里,取得了鲜明彻底的经典形式,所以被称之为启蒙运动的见解。塞尔坚持并维护启蒙运动的见解,认为存在着绝对的、惟一的、客观的、完全不依赖于我们而独立存在的实在世界,我们能够不断理解这个客观世界的本性,我们对这个世界中的对象、事态的陈述是真的还是假的,取决于这些陈述是否与世界中的事物相符合。塞尔还把承认有一个不依赖于我们而独立存在的实在世界的观点称之为“外部实在论”。按照“外部实在论”,世界上独立于心灵的许许多多事物,如氢原子、地壳运动板块、病毒、树木、银河等等,这些现象的实在性是不依赖于我们的,宇宙在任何人类或其他有意识的生物出现之前很久很久就存在了,而且在我们全部从地球上消失以后仍将长期存在。这种外部实在论观点是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前提。然而,否认和攻击外部实在论的哲学思潮持续不断,经久不衰。塞尔分析了历史上贝克莱和康德的唯心主义,又着重分析了20世纪以来否定外部实在论的新形式,批评了视角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种种怀疑论否定实在世界独立存在的观点,回答了种种挑战,还指出现代科学(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和现代逻辑提出的新成果和新问题并没有推翻启蒙运动的见解和外部实在论观点。

三、在心灵问题上的“生物学的自然主义”。塞尔把这种外部实在论的基本形而上学作为他解决心灵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坚持从实在世界本身的发展来说明心灵和意识现象。塞尔认为,实在世界是由那些可能称之为“力场中的微粒”所构成,这些微粒构成各种大的系统,太阳系是其中之一,我们居住的行星(地球)则是它的一个子系统。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某些由羧基分子所组成的生命系统是经过长期演化而成的各种生物物种,生命系统的物种有些是动物,有些动物具有神经系统,某些神经系统能够引起并保持意识,而有意识的动物通常又都具有意向性。塞尔依据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和生物进化理论,认为心灵和意识是物质微粒构成的实在世界长期演化的产物,是这个实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心灵和意识是由一种生物学过程所引起的生物学事实,是一种自然过程,并非什么神秘莫测的现象。但是,他认为意识具有内在的、主观的、质的特征,意识状态具有第一人称的存在方式,意识的这种“第一人称本体论的主观性”是不可还原、不能归结为或等同于物质的东西的。在对意识和心灵的看法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二元论和唯物主义的争论,二元论(包括实体二元论和属性二元论)把意识看成某种独立的、神秘的、根本上不同于物质的或物理的实在的现象。塞尔认为,二元论是错误的。但他同时又认为,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还原为物质的现象,不承认意识的不可还原性,所以他又反对唯物主义。他坚持认为意识是由脑过程所引起的一种生物学现象,但认为意识具有不可还原的第一人称本体论的主观性。在他看来,这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从意识的微观基础来看,在较低层次上可能通过神经系统、突触以及神经传导纤维的神经生物学过程、生物化学过程来解释意识现象的原因,而意识则是大脑过程的更高层次上的特征。塞尔把

他对心灵和意识的这种基本立场称之为“生物学的自然主义”。说它是“生物学的”，是由于对精神现象的说明方式是生物学方式；说它是“自然主义”是因为这种观点主张心灵是自然的一部分。塞尔所反对的唯物主义，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所提到的行为主义、物理主义、功能主义和强人工智能论，这些学派都有把意识现象归结为、还原为生理和物理的现象，把心理语言还原为物理语言的倾向，但他似乎并不了解，也可能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反对将意识归结为物质，又反对把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的。

四、在本书中，塞尔在他的生物学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力图把他的意向性理论、语言行为理论和社会实在的理论统一起来。塞尔在他的《意向性》一书中，就论证了语言行为和意向性的密切联系，在本书中，他坚持和深化了这种见解。他指出，从发生学上看，儿童的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是共同发展起来的，它们是互相促进、互相丰富的；从语言的使用来看，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言语行为必须通过意向性来执行；就其物理特征来看，语言只是一些发出的声音和写在纸上的墨迹，是意识和意向性赋予这些声音和符号以一定的意义。说话人说出话语并赋予其意义，都是说话人的意向性使然；从结构特征来看，言语行为和意向性都具有类似的满足条件和适应指向。关于意识、意向性、语言和社会现象的密切联系，本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塞尔认为，自然的、物理的实在是不依赖于人类心灵而独立存在的，而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如货币、语言、财产、婚姻、政府、大学、律师、总统、足球比赛、鸡尾酒宴等），则是依赖于观察者、依赖于人类心灵的，心灵通过意向性与外部实在世界相联系，意识和意向性都是某种生物学过程引起的生物学事实，然而它们又创造了与观察者相联系的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

在并不是凭借其物理特性来执行其功能,而是凭借集体的接受、承认或相信某种事物具有某种功能,这种功能被称为地位功能。集体地赋予地位功能使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具有认识论的客观性。人类通过集体意向性赋予事物以地位功能,从而创造了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集体的接受、承认或集体的意向性必须通过语言来表示某种对象具有某种功能。在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物,而且参与建构事实。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性实在,同时,它又通过一种执行话语和建构性规则来创造和建构制度性实在。这样,塞尔便以他所特有的方式说明了意向性、语言行为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的联系。

塞尔在本书中吸取了现代科学特别是神经生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以及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了理论论述的内容。在哲学上,吸取了分析哲学以外大陆哲学家的问题、概念与成果,例如,无意识心理学、权力意志等,然而都加以新的综合,推进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分析哲学的传统框架。

本书根据珀修斯图书集团的基础图书公司1998年出版的《心灵、语言和社会》译出,书中涉及哲学和其他许多学科,如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概念和用语,虽然我们查阅了多种有关资料和辞典,但仍然可能有不尽准确妥帖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著名哲学家、现代西方哲学专家江天骥先生的热情帮助,谨表深切谢意。

李步楼

# 目 录

001	导论
001	第一章 基本的形而上学：实在与真理
001	启蒙运动的见解：实在及其可理解性
007	入门性的哲学
010	默认点
012	实在与真理：默认点
021	对实在论的四种挑战
028	怀疑论、知识和实在
033	对外部实在论能有辩护吗？
035	超越无神论
040	第二章 我们怎样和宇宙协调一致：作为生物学现象的心灵
040	意识的三个特征
046	默认点的冲突：心身问题
055	意识的不可还原性
058	副现象论的危险
063	意识的功能
064	意识、意向性和因果性

066	<b>第三章</b>	<b>心灵的本质：意识及其结构</b>
068		对意识的三种错误看法
072		意识的结构性特征
078		意识域与联结问题
081		意识和价值
083	<b>第四章</b>	<b>心灵如何运作：意向性</b>
084		意识和意向性
087		自然化的意向性：默认点之间的另一种冲突
093		被自然化为一种生物学现象的意向性
097		意向状态的结构
102		意向的因果性
105		意向性的背景
108	<b>第五章</b>	<b>社会世界的结构：心灵怎样创造一个客观的 社会实在？</b>
109		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
112		对观察者的依赖和建造社会实在的部件
121		建构制度性实在的一个简单模型
123		货币的例子
125		制度性实在怎么会如此强大有力
128		对问题和困惑的解决
132	<b>第六章</b>	<b>语言如何工作：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言语</b>
133		言语行为：以言行事的行为和以言取效的 行为
136		“meaning”的多种意义

140	意义和交流
142	各种类型的言语行为
148	建构性规则和符号系统
158	对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162	主题索引



## 导 论

任何一个就各种题目撰写著作的人最终都一定会感到有一种冲动：要写一本书来说明这些不同的题目互相之间是怎样关联的，这一切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本书正是这样一种著作。在这本书中，我至少试图以概要的形式来说明我关于心灵、语言和社会的一些观点，说明这些观点是怎样相互关联的，它们是怎样与我们当代对宇宙的总体概念相适应的。事实上，我最初就想用“这一切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作为这本书的副标题。

促使我着手去实现这一计划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1984年应英国广播公司的真诚邀请作了里思学术系列讲座，<sup>①</sup>它们以《心、脑与科学》为书名于当年出版，该书的论述范围也是同样的广泛。这两本书都力图以非专业的人都可以了解、但又不牺牲知识的复杂性的方式来论述范围广泛的问题。前者停留在心和脑的层面上。一般而言，现在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试图从心灵攀登到语言和社会实在的层面上。

这两本书都体现了影响广泛的当代哲学潮流。在很多哲学家看来，心灵哲学现在是第一哲学。处理语言、知识、伦理学、社会、自由意志、合理性等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最好要通过对精神现象的理解，至少在我这里，它们是通过一种对心灵的分析

---

<sup>①</sup> J·R·塞尔：《心、脑与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方法来进行的,这种方法既拒斥二元论,也拒斥唯物主义。我打算写一本关于心灵、语言和社会的书,现在已经写成,我发现书中关于心灵的部分占的比例太大。考虑到论证得以进行的知识基础已经给定,所以这样偏重心灵问题也就不至于令人惊讶了。

我不无惭愧地采用了我早先著述中的内容。参加过那些工作的朋友们对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也许理所当然地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只能说,为了能告诉你这一切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我必须告诉你我以前说过的一些东西。

有几个人曾帮助我为这本书做准备工作。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詹尼弗·胡丁;尤其是要感谢我的妻子达格玛·塞尔,她像往常一样,在每个阶段上都给我帮助。我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妻子。

# 第一章

## 基本的形而上学： 实在与真理

### 启蒙运动的见解： 实在及其可理解性

从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时代直到 20 世纪的头几十年 ,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 ,可能都相信自己应该知道并理解关于宇宙如何运作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从哥白尼革命 ,通过牛顿力学、电磁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 ,人们意识到宇宙有一种意义 ,有一种可理解性 ,而且通过知识和理解的稳定持续的增长 ,它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解。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 ,甚至可能感到科学知识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完全一致 ,甚至成为宗教信仰的附加物。这种信念要求区分两种形而上学领域 :一方面是心灵的或精神的领域 ,另一方面是物理的或物质的领域。宗教拥有精神的领域 ,科学则拥有物质的领域。心物两个领域的这种区分似乎可以独立地得到证明 ;事实上 ,它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并且在勒内·笛卡尔这位对 17 世纪科学革命作出很大贡献的哲学家的著作中获得了最著名的表述。就连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伟大的、“颠覆性”的革命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

马克思,也认为他们的工作是自17世纪以来所得到陈述的科学发展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都拒绝笛卡尔的二元论。弗洛伊德认为他在创造一种心灵科学,而马克思则认为他在创造一种历史和社会科学。

简言之,在西方文明发展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人们设想宇宙是完全可理解的,我们能够系统地理解它的性质。由于这两个设想是在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系列经典陈述中得到表达的,所以我建议把它们称之为“启蒙运动的见解”。这种乐观主义的见解,在19世纪末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其中两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及英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理智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许多事件使有关事物本性以及我们理解这种本性的能力的传统的乐观主义受到了挑战和削弱。在我看来,对于19世纪的理智乐观主义最大的一次心理打击根本不是理智本身的发展,还不如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然而,对于启蒙运动的见解也有一些纯粹的理智方面的挑战。无论是实在世界的可理解性,还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似乎都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第一,相对论对我们关于空间和时间、关于物质和能量的最根本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例如,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假设我们以接近光的速度到达一个星球又返回来花了10年时间,我们的年龄长了10岁,但是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却会增长100岁,那么我们怎样来理解这个宇宙呢?第二,集合论悖论的发现似乎对作为合理性的堡垒——数学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如果数学的基础中包含了矛盾,那么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了。正如弗雷格本人在面对罗素悖论时所说的那样:“你所发现的矛盾使我感到

难以形容的惊奇,我几乎要说,它使我有晴天霹雳之感,因为它已动摇了我打算据以建立算术的那个基础。”它似乎“不仅削弱了我的算术的基础,而且削弱了算术本身的惟一可能的基础”<sup>①</sup>。第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是被当作通向改善了的合理性的途径,而是被看作对合理性之不可能的一种证明。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理性的意识只是非理性的无意识之海中的一个岛屿。第四,库特·哥德尔对不完全性的证明似乎对数学发起了另一次进攻。在数学系统中有许多真的陈述,我们都能够知道它们是真的,但在那些系统中又不可能证明其为真。而在哥德尔之前,数学中的“真”的意义似乎就意味着“在数学上是可证的”。第五,最糟糕的是,按照某些解释,量子力学似乎与我们传统的决定论的概念以及物理宇宙独立存在的概念完全不相容。量子力学似乎表明,在最基础水平上的物理实在是非决定论的,而且,有意识的观察者就在其观察活动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他(或她)正在观察的那个实在。第六,在20世纪后期,科学本身的合理性受到来自像托马斯·库恩和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这样的作者的攻击,他们争辩说,科学本身受到任意性和非理性的影响。人们认为库恩已表明,一场大的科学革命不仅是对同一实在的新的描述,而且创造了不同的“实在”。他说:“在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sup>②</sup>而且许多人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已指出我们的话语是一系列相互不可翻译、不可公约的语言游戏。我们不是在从事一个有着普遍合理性标准、对每个

---

① G·弗雷格:《哲学和数学通信》(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32页。

② 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35页。

人来说一切都是可理解的大的语言游戏,而是在从事一系列比较小的语言游戏,其中每一个游戏都有各自的可理解性的内在标准。

我还可以把这个枯燥无味的列举加以扩充。例如,有几位人类学家宣称,没有普遍有效的合理性,只有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合理性。类似的几种相对主义已成了被总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理智运动中的共同的东西。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自己正在向启蒙运动的见解发起挑战。

我首先把我的想法亮出来:我接受启蒙运动的见解。我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而存在,在我们的进化着的天赋所确定的范围之内,我们能够达到对于世界之本性的理解。我相信,自19世纪以来的真正的变化不是世界以某种令人兴奋的和天启的方式变得不可理解,而是这样,由于令人烦恼和单调乏味的原因,这个世界很难理解,所以,你必须变得更聪明些,知道更多一些。例如,要懂得现代物理学,你就必须知道大量数学知识。我不打算回答所有这些对启蒙运动的见解的挑战,那需要好几本书。相反,由于我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性的,所以我将简短地陈述我为什么对刚才所介绍的那些论点不感到担忧,然后我将比较详细地从各个方面回应“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

第一,相对论并不是对传统物理学的拒斥,而是对它的推广。它要求我们以反直观的方式来思考空间和时间,但这并不对宇宙的可理解性构成威胁。值得回顾的是:牛顿力学在17世纪似乎也是悖乎常理的。第二,逻辑悖论,无论是语义悖论还是集合论悖论,在我看来除了我们可能犯的哲学错误以外,并没有表明别的什么东西。正如芝诺关于空间、时间或运动的著名悖论并不表明时间、空间和运

动的非实在性<sup>①</sup>一样,逻辑悖论也并不表明在语言、逻辑和数学的核心存在着任何矛盾。第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不管它对人类文化有什么样的最终贡献,但它不再被严肃地看作是一种科学理论。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继续存在,但极少严肃的科学家会认为它对人类的心理学发展和病理学提供了一种能用科学方法充分予以证实的说明。第四,哥德尔的证明对于传统的将本体论(何物存在)与认识论(我们如何认知)分开的理性主义观念来说,是一种支持。真理是一个与事实相符合的问题。如果一个陈述是真的,那么必定有某种事实使之据以为真。事实属于何物存在的问题,是本体论的问题。证明和证实属于寻找真理的问题,因而是认识的概念,但不能把它们与我们所要寻找的事实混淆起来。哥德尔无可争辩地表明数学真理不能与可证明性相等。第五,我也同意按照某些解释,量子力学是对启蒙运动的见解的一种严肃认真的挑战,而我在专业知识上也没有资格对它的意义作出严格的评价。然而,我想把两种不同的主张区别开来:一种主张认为量子力学在微观层次对宏观层次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非确定性;另一种主张认为量子力学表明实在并没有不依赖于观察者的独立存在。就我所知,在作为一种关于实在的事实的微观-宏观关系上,我们就是要接受一定程度的、统计学意义上的非确定性。然而,在我看来,在量子力学的实际结果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有意识的观察者在部分地创造被观察的实在。这种悖乎常理的东西并不存在于实验的实际结果之中,而是存在于对这些结果的不

---

<sup>①</sup> 芝诺的论证,举例来说是这样的,为了通过这个房间,我们首先必须通过房间的一半,但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又必须通过这个一半的一半,如此以至无穷。芝诺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运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